



(英)威尔基·柯林斯著

白衣女人

白 衣 女 人

〔英〕威尔基·柯林斯 著

曹苏玲 戴侃 庄经传 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32开本 22.25印张 9插页 430,000字

1931年10月第1版 193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5,000册

书号 10261·52 定价 2.40元

内 容 简 介

《白衣女人》(The Woman in White)是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成名之作,与她的另一部作品《月亮宝石》同享盛名,曾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并受到同时代文学大师狄更斯的赞扬。本书是初版的中译本。

故事围绕一对同母异父姊妹玛丽安和劳拉的遭遇而展开。富有而单纯的少女劳拉,在父辈不负责任的安排下,屈从于礼教,牺牲了自己和青年教师沃尔特的爱情,嫁给珀西瓦尔爵士为妻;而爵士为了攫取劳拉的几万镑财产,与她的姑父福斯科伯爵串通,耍弄阴谋,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和劳拉相貌酷似的孤女安妮迫害致死,然后把她当作“爵士夫人”公开举行葬礼;同时,又将劳拉冒充精神病患者安妮,送进疯人院。在不能诉诸法律而又孤立无援的困境下,沃尔特和玛丽安出于对劳拉纯真的爱,凭着机智和勇敢,历尽艰辛,帮助劳拉脱险雪冤。劳拉和沃尔特终于建立了幸福的家庭。透过他们的冒险苦斗,小说揭开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隐情:原来那个所谓爵士,出生前的家世纯属伪造,其爵位和财产是全靠骗来的;那个文雅多情的老伯爵,却是个罪恶累累的亡命之徒;白衣女人安妮为何与劳拉长相酷似?原来她竟是劳拉父亲的私生女。父辈造下的罪孽,却让子女承担了深重的苦难!

读者可从本书看到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珠光宝气掩盖之下的罪恶,以及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故事情节曲折,结构巧妙绵密,性格刻画细腻;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这部小说采取各种人物分段叙述然后连贯起来的手法,具有独特的风格。

第 一 部

由美术教员沃尔特·哈莱特在克莱门茨旅社开始讲述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明女性的忍耐和男性的刚强能达到什么程度。

如果能依靠司法部门去审理每件疑案，处理每次侦讯，金钱贿赂的影响在这中间只适当地起次要的作用，那么这里所讲的故事在法庭上必然会引起公众的注意。

但法律在某些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毕竟仍然是追求金钱的忠实奴仆，因此也就只得在这里第一次讲述这个故事。读者现在将要听取的和当初法官可能听取的是相同的内容。故事的重要情节，自始至终没有一处是以传闻作根据的。发生的事件和这段开场白的作者（名叫沃尔特·哈莱特）的关系比其他人更密切时，就由他本人来叙述。遇到他没有经历过的事，就不再由他来叙述，而由那些事件的目击者来承担这项任务，由他们从中断的地方继续陈述他们各自的所见所

闻，并且做到象哈莱特叙述的那样清楚明瞭，切实可靠。

这么一来，叙述这个故事的笔者就不止一个人，象法庭上由若干证人出庭陈述犯罪的事实，同样一件事从两个方面叙述，从最直接、最容易明瞭的角度来介绍事实真相；在追查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中，让那些在互相连续的各个阶段与事件最有关联的人逐一叙述他们各自的经历。

让我们首先听取二十八岁的美术教员沃尔特·哈莱特的陈述吧。

二

那是七月的最后一天。漫长而炎热的夏季已接近尾声；我们这些浪迹街头、精疲力尽的伦敦客，早已开始向往麦田上空的朵朵浮云和海滩上的习习秋风了。

对于可怜的我来说，即将逝去的夏天，不仅使我失去了健康，变得无精打采，而且如果说老实话，我还变得不名一文。过去一年，我没有象往常那样，对我绘画的收入精打细算，花得多了一些，现在顶多只能在汉普斯泰德我母亲的小房子里和我在城里的住处凑合着度过秋天了。

我记得那天傍晚阴沉沉的，纹风不动；伦敦的空气显得异常沉闷；远处营营的市声也非常微弱；我个人的生命微微搏动，我周围城市巨大心脏的跳动，仿佛都无力地随着夕阳一同沉落了。起初我在看书，其实是在那里打盹，后来我就推开书本，到郊外去领略夜晚的凉意。我通常每星期总要有两个夜晚跟母亲和妹妹一道度过，而那晚正好该到她们那里去，于是我就向北，朝汉普斯泰德的方向走去。

在我叙述发生的事情之前，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在我讲到的这个时期，我父亲已去世多年，五个儿女只剩下妹妹萨拉和我。我父亲原先也是美术教员。由于他的勤奋努力，他在事业上很成功，他对靠他的劳动赡养的人十分关心，为了替他们筹划未来，他不得不在结婚以后就拨出相当大一部分收入作为人寿保险，而一般人是不会认为有必要为这个目的拨出这样大的数目的。多亏他十分精明克己，在他身后，我母亲和妹妹才能象往日一样，不用为生计操劳。我继承了他的来往关系，使我开始步入生活时，对摆在我面前的前程怀着感激的心情。

当我来到母亲的小屋时，寂静的夕阳还在希恩山的山脊上迷离闪烁；而我脚下的伦敦城却已陷入一片云雾缭绕的、黑沉沉的夜色之中了。我刚接门铃，门就猛地打开了；开门的不是仆人，而是我的好友佩斯卡教授，他兴高采烈地跑出来迎接我，尖声学着用英语打了个招呼。

为了他，也是为了我的缘故，我有必要对教授作一番正式介绍。偶然的事件使他成了我将要叙述的这个离奇的家庭故事的开端。

我当初是在一些名门显贵的家中遇到这位意大利朋友，才和他相识的，他在那里教授意大利语，我教绘画。对于他的经历，当时我只知道他曾在帕达大学任职；出于政治原因离开了意大利（什么政治原因，他对任何人总避而不谈）；他在伦敦定居多年，以教授语言为职业，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

佩斯卡虽然不是真正的侏儒——因为他从头到脚生得非常匀称，但我想他是我在展览室以外见到的最矮小的人。除

了他的身材在各地都显得特殊外，他的个性在人们中也显得乖僻，但他没有恶意。他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英国人，藉以表示对为他提供避难所和生活出路的国家所怀有的感激心情。教授并不满足于尊重这个国家的一般习惯，一定要携带雨伞，穿套鞋，戴白色礼帽，他立志要让自己在习惯、趣味以至个人的仪表方面都变成一个英国人。他发现我们是一个特别爱好运动竞技的国家，这个身材矮小的人就天真地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参加英国的各种运动和娱乐；他坚信只要照自己的意志去努力，他一定能做到象穿我国的套鞋和戴我国的白色礼帽那样，接受我国的运动爱好。

我就曾经看见他冒着折断四肢的危险，没头没脑地猎狐狸和玩板球^①；不久之后，我又看见他同样没头没脑地在布赖顿海上冒生命的危险。

我们偶然在这里相逢，一起洗海水浴。假如我们一道参加我国的某项运动锻炼，我当然会小心翼翼地照顾佩斯卡；但是，外国人通常都能象英国人一样，在水里很好地照顾自己，我万万没有料到在男子游泳技术训练的名单上还应该加进去一名，而教授自己认为他当场就能学会。我们刚游离海滩不久，我就停下来了，因为我发现我的朋友没有跟上来，我于是回过头去寻找他。使我大为惊骇的是，我在海滩上什么也没有发现，只见水面上有两只白皙的小胳膊挣扎了一下，就消失不见了。我连忙洒水追踪，只见可怜的人儿蜷缩做一团，静静地躺在水底的砂石坑里，比我原来看到的他显得小

① 双方各十一人玩的一种英国最流行的球戏。

多了。当我把他拉起来时，因为透了空气，他缓醒过来，身体的机能在我的帮助下渐渐恢复了。他的精神稍稍恢复一些，就谈起他对游泳的可笑想法。咯咯发抖的牙齿刚刚能张开说话，他就茫然地微笑说，他想，大概是因为抽筋的缘故。

当他完全恢复过来，跟我一起登上海滩，他那热情奔放的南方性格就立刻挣脱英国化的人为约束，奔泻开来。他用狂热的词句向我表达了他对我的感情，使我感到震惊，他用夸张的意大利方式热情地对我说，从今以后他要把他的一生交给我安排，并且声明说，他一定要找机会为我做一些使我终身难忘的事，表明他对我的感激，否则他一辈子也不会幸福。

我尽力使他止住滚滚的热泪和连珠炮般的表白，一直把这次遇险当做一个笑话来谈；最后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把佩斯卡对我的一股强烈感激的心情减弱了。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后来当我们愉快的假期即将结束时，我也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可爱的伙伴热切盼望为我效劳的机会，竟然很快就到来了；他连忙抓住这个机会，这样一来，他就使我整个生活的流程转向新的渠道，使我变得几乎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但这毕竟是事实。当佩斯卡教授躺在那砂石的海底，如果我没有洒水去救他，那么，很可能我就永远不会跟我在这里要讲的故事有任何关系，也许，我甚至连那位女郎的名字也永远不会听说，而正是她现在占据了我的全部思想，占据了我的灵魂，成为指导我生活目标的一个有影响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三

那天傍晚在我母亲家门口遇到佩斯卡教授时，他颇为得意，那副神态表明他要告诉我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但是，要他马上讲出来是枉然的。他双手拖着我进屋，我只好一面猜测。他知道我的习惯，知道今天晚上到这里来一定会碰上我，他要告诉我一件特别令人高兴的消息。

我们两人很不礼貌地一下子闯进客厅。我母亲正坐在开着的窗口旁，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自顾扇扇子。佩斯卡是她特别宠爱的客人之一，他的一些最古怪反常的鲁莽行动，她总认为无可厚非。可怜的人啊！当她一发现这位身材矮小的教授对她儿子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时，她就毫无保留地向他打开了心扉，把他那些令人难于理解的异国癖性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很少想到要去弄个究竟。

我妹妹虽然年轻，但说也奇怪，却不那么随和。她充分肯定佩斯卡教授内心的美德，但却不能做到象母亲那样，为了我的缘故，对他盲目迁就。她拘于礼节，因此对佩斯卡不修边幅的生性很反感；她见母亲对这个古里古怪、身材矮小的外国人那样亲热，总毫不掩饰地或多或少感到吃惊。我发现，不仅我妹妹，其他人也一样，我们年轻的一代都不象老一辈那样热情洋溢，感情冲动。我经常看见老年人因为有机会痛痛快快地玩，而兴奋激动，可是，他们的孙子、孙女们却兴味索然，无动于衷。不知道我们现在的青年男女是否象我们的长辈年轻时那样，真有年轻人的样子。是否因为教育有方，大有进步，因而我们这些生活在当前新时代的小人物

就显得过份有教养了？

我并不打算明确回答这些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每次我见母亲和妹妹在一起，只要有佩斯卡在场，母亲总要显得比我妹妹还年轻。就拿这次来说吧，老太太见我们闯进客厅，她孩子气地、由衷地哈哈大笑起来，而萨拉却忙着收拾在教授慌慌张张跑出去给我开门时，从桌上碰掉在地上的茶杯碎片。

“沃尔特，你要是再迟一点来，”母亲说，“我真不知会出什么事。佩斯卡都急得要发疯了；好奇心使我也快要疯了。教授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跟你有关系，可是，他太狠心了，不等到他的朋友沃尔特来，他一点也不肯向我透露。”

“太气人了，茶具都不成套了，”萨拉难过地望着茶杯的碎片，伤心地自己嘟哝说。

她说这话时，佩斯卡正兴高采烈，忙忙叨叨，并没有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亲手打碎了茶杯。他正把一张扶手椅拖到房间的一头，象演说人对听众公开演说那样，对我们三个人发号施令。他把椅背转向我们，跪到椅子上，对我们这仅有的三名听众慷慨激昂地发表起他的即席演说来。

“我可爱的人们，现在，”佩斯卡开口说（他的意思指“朋友们”时，他总说成“可爱的人们”），“听我说，是时候了，我要宣布我的好消息了，我要宣布了。”

“听着，听着！”我母亲凑趣地说。

“妈妈，他要是再弄坏东西，”萨拉悄悄说，“那就该轮到这把精致的扶手椅的靠背了。”

“我要对一个最高尚的人说，我能重新活转来，”佩斯卡从椅背横梁上激动地唤着我不值一提的名字，继续说，“是他发现我死在海底（因为抽筋），是他把我拖到水面上来；当我活过来，重新穿上衣服的时候，我说过什么话呢？”

“简直完全没有必要，”我拚命固执地答道；因为一讲到这个话题，只要稍稍鼓动他一下，就肯定会触动教授的感情，使他痛哭流涕。

“我说过，”佩斯卡坚持说下去，“我的有生之年都属于我亲爱的朋友沃尔特……事实上也是这样。我说过，我一定要找机会为沃尔特做点好事，否则我永远不会幸福。除非这个最幸福的时刻到来，否则我会永远对自己不满。现在，”小个子热情洋溢地扯着嗓子喊起来，“强烈的欢乐象汗珠一样从我的每一个毛孔里沁出来，我以我的名誉、人格担保，我总算确实做到了我要做的事，现在，我只有一句话要说，那就是，太好了！”

也许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佩斯卡以一个道地的英国人自诩，不但在穿着、举止、趣味方面，而且在语言方面，他只要学到某些我们最常用的口语语汇，就在他的谈话中，不论场合，到处引用。他对这些语汇的发音特别感兴趣，完全不问是什么含意，随他自己把这些语汇组成复合语或重叠语，而且经常把它们连成一个仿佛是长音节的词汇。

“在我教授意大利语的伦敦一些名门望族中，”教授不加开场白就单刀直入，讲起他迟迟不讲的那件事来，“有一个了不起的上等人家，在一个叫做波特兰广场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这地方在哪里吧？是了，是了，当然而又当然。我亲爱的人们，这是一个上等的家庭，母亲，很漂亮，很胖，三位年

轻的小姐，很漂亮，很胖；两位年轻的先生，很漂亮，很胖；父亲更是他们当中最漂亮，最胖的；他是个了不起的大亨，攒很多钱。他本来长得很好看，可现在头也秃了，下巴成了双层的，所以不那么好看了。现在，听我说！我教年轻的小姐们读著名的但丁。哎呀，真是奇怪，奇怪！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三位机灵的小脑袋被但丁搅得晕头转向！这不去管它，对我来说，正好课越多越好。现在，听我说，你们想象一下，今天我跟往常一样，给年轻的小姐们上课。我们四个人一起在但丁的地狱里^①，在第七层，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对这三位又漂亮又胖的年轻小姐说来，哪一层都一样；不过我的学生还是在第七层上卡住了；我确实要她们继续往下走，我又是朗读，又是讲解，正讲到热闹非凡，不可开交的时候，走廊里传来一阵皮靴声，跟着好爸爸就进来了，就是那个秃了顶，双下巴的大亨。哈，我亲爱的人们，我现在要比你们预料的更快，要转入正题了。你们一直在耐心听吗？没有在心里抱怨：‘见鬼，见鬼！怎么佩斯卡今天晚上罗嗦个没完了？’”

我们说，我们很感兴趣。教授接着说：

“那位好爸爸手里拿着一封信，他先为自己家庭生活琐事打扰了我们的地狱表示歉意，然后就对三位年轻的小姐说话了。他开头也象英国人说什么话都要先大‘噉’一声。‘噉，我亲爱的，’大亨说，‘我这里收到一封我的朋友某先生的信’（名字我忘记了；但是不要紧；我们还要回过头来再说的；是了，是了，好的，好的）。于是爸爸说，‘我收到我朋友的一封信’

① 指但丁的《神曲》。

信；他要我介绍一位美术教员到他家乡去。’天啊，我的天！当我一听这位好爸爸说这话，我要是个子再高一点，当时我就会跑到他跟前，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把他紧紧地、紧紧地搂到我怀里！但实际上我只在椅子上动了几下。我如坐针毡，忍不住要开口；但我没有吱声，让爸爸往下讲。‘也许你们知道，’大亨说着，用手指象这样滴溜溜地转动着这封信，‘亲爱的，也许你们知道，我能推荐哪一位美术教员？’三位年轻小姐面面相觑，然后说（也照例先大‘噫’一声），‘噫，爸爸，我们可不知道！不过佩斯卡先生在这里……’她们一提到我，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我亲爱的人们，想到你们，我的血就涌上来了，我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仿佛从地上长出一颗长钉穿透了我的扶手椅，我就对大亨说，我说（用典型的英语说法），‘亲爱的先生，我有一个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第一流的美术教师！您今天写封信推荐他，明天就打发他连人带行李（哈哈，又是一个典型的英国说法！）打发他连人带行李上火车！’‘且慢，且慢，’爸爸说，‘他是外国人，还是英国人？’‘道道地地的英国人。’我答道。‘为人正派吗？’爸爸说。‘先生，’我说（他最后这个问题使我发火了，我对他也不客气了），‘先生，这个英国人胸中燃烧着熊熊的天才之火，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父亲也是才华盖世的！’‘他的才华先不要去管，’这位缺乏修养的好爸爸说，‘佩斯卡先生，先不要去管。在我们这个国家先不问才华，除非他同时品格也很高尚，那我们就非常满意，实在非常满意了。你的朋友拿得出证明吗？能拿出一些信件说明他的品德吗？’我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证明？’我说。‘哈！天啊，我的天！我想肯定会有。只要你乐意要，他能拿出成捆的信件，成箱的证

明材料！’‘有一两份就够了，’这个有钱人冷静地说。‘让他把证明材料寄给我，写上他的姓名、地址。还有，等等，等等，佩斯卡先生，你去找你的朋友时，最好带上张字条。’‘支票！’我愤愤地说。‘对不起，这个高尚的英国人还没有挣到工资以前，用不着支票。’‘支票！’爸爸大为吃惊说，

‘谁说支票了？我是说写张便条，约法三章，把我们对他的要求写上。继续讲你的课吧，佩斯卡先生，我会把我朋友信里有关的地方摘抄下来给你。’大亨说完就坐下来，取出墨水和纸笔，我又跟三位年轻小姐一道进到但丁的地狱里去了。过了十分钟，字条写好了，于是爸爸的皮靴声又在门外走廊里消失了。从那时起，说真的，别的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终于找到了机会，为感激世界上我最亲密的朋友，为他效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个愉快的想法突然在我脑中闪现，使我飘飘然起来。我是怎样把三位小姐又从地狱里带出来，后来做了些什么其他事，怎样吃下我那小小的一份午餐，我都不知道了。我现在总算带着大亨的条子到这里来了，我简直象生命那样伟大，象一团火那样热烈，象国王一样快乐！哈！哈！哈！好，好，好极了！’这时教授在头顶上挥舞着那张写着条件的字条，用他那尖声尖气的意大利腔模仿英语欢呼了一句，结束了他这番滔滔不绝的讲话。

他刚说完，我母亲就满脸通红，目光炯炯地站起来，热情地握住这位小个子的双手。

“我亲爱的好佩斯卡，”她说，“我从来不怀疑你对沃尔特的一片赤诚，现在我更加确信不疑了！”

“我想，为了沃尔特，我们很感激佩斯卡教授，”萨拉补充说。她说话时，稍稍欠起身，似乎该她到圈椅跟前去了，

但是，她见佩斯卡欣喜若狂地连连吻我母亲的双手，就露出一本正经的样子重新坐下来。“既然这个随随便便的小矮子能对我母亲这样，对我会怎么样呢？”一个人脸上的表情往往是真情的流露，当萨拉重新坐下时，脑子里无疑就是这样想的。

我尽管知道佩斯卡是一片好意，对他很感激，但并没有象应该的那样，陶醉在未来工作的美景之中。教授吻够了我母亲的手，我感谢过他对我的关心，之后我就请他把尊敬的主人提出的条件给我看看。

佩斯卡得意地把手一挥，把字条递给我。

“你看吧！”小个子煞有介事地说。“我的朋友，我向你保证，这位好爸爸提出的条件，可是跟喇叭里吹出来的一样，响亮得很哪。”

这个字条上的条件简单明了，开门见山，总之，一看就懂。便条上写道：

第一，坎伯兰利默瑞吉家族的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拟聘请一位有才能的美术教师，聘用期为四个月。

第二，教师将负责两项工作。负责教授两位年轻小姐画水彩画；此外，课余时间整修和粘贴一些未加精心管理的名画。

第三，为承担这两项工作的应聘教师每周付四金币报酬；教师将住在利默瑞吉庄园，并受到应有的礼遇。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应聘者须首先提出一份十分令人满意的德才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可寄交费尔利先生在伦敦的朋友，已授权由他负责签定合同的必要事宜。四条之后是佩斯卡主人的姓名、在波特兰广场的住址。便条或备忘录就此结束了。

这份聘约提供的条件当然是吸引人的。工作看来轻松随意；要我在秋季工作，那是我一年中最闲的季节；而且根据我个人的工作经验来判断，条件非常优厚；我知道，如果我能得到这个工作，那是很幸运的，但我看完聘约后，心里却禁不住立刻生出一种不愿接受这件工作的情绪。我发现在我过去的经历中，我的工作和我的爱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相互矛盾，使我感到说不出的痛苦。

“啊，沃尔特，象这样的机会你父亲从来没有碰到过一次！”母亲看完聘约，递还给我的时候说。

“可以结交这样有身份的人，”萨拉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报酬条件又这么优厚！”

“是啊，是啊，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是够好的了，”我不耐烦地答道，“但在我交证明材料之前，我还得稍稍考虑一下……”

“考虑！”母亲大声说。“考虑什么，沃尔特，你怎么了？”

“考虑！”我妹妹也应声说，“在这种情况下，说这话太奇怪了。”

“考虑！”教授也附和说，“有什么可考虑的？你来回答我！你是不是抱怨过你身体不好，是不是很想——照你的说法，吸吸乡间的空气？那好！现在你手里的聘约就可以向你提供足足四个月时间，尽情享受乡间的空气。不是这样吗？哈！还有，你需要钱。那好！每周四块金币难道不算什么吗？天啊，我的天啊！要是给我，我也会象那位好爸爸一样，靴子格登格登响，多么神气，阔绰！一星期四块金币，还加上跟两位年轻的小姐在一起；此外，免费让你住宿，免费供应早餐、午餐，随意品尝英国的午茶，免费供应晚餐和

冒泡的啤酒，怎么，我亲爱的好朋友，见鬼，活见鬼！我从来没见过象你这样的怪人！”

我母亲对我的态度显然感到吃惊，佩斯卡好心肠一一列举了这个新工作给我带来的好处，这都丝毫没有打动我，我讲不出理由，就是不想去利默瑞吉。我把不去坎伯兰的鸡毛蒜皮的理由讲了一遍，然后又听他们逐条予以反驳，我真是狼狈不堪，只好摆出最后一块挡箭牌，对他们说，如果我教费尔利先生的两位年轻小姐写生，那我在伦敦的学生怎么办？答案很简单，他们大多都要去做秋季旅行，少数留在家里的学生，可以委托给我的一位当美术教员的同行代课，同样情况下，我也曾给他的学生们上过课。妹妹提醒我说，如果我现在愿意离开伦敦，我那位同行愿意为我代课；我母亲还严肃的向我提出，千万不要因为毫没来由的任性，妨碍了这样的好事和我的身体健康；佩斯卡更是苦苦哀求我不要拒绝，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用行动来感激我对他的救命之恩，拒绝他，会使他感到难过。

这些坦率的，发自肺腑的热心的劝告，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人都会有所感动的。我尽管无法消除我自己也解释不清的不愿去的心情，但我至少因此心里感到很惭愧，最后我让步了，我答应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就这样圆满地结束了这场争论。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过得很愉快，大家兴致勃勃地猜测我和坎伯兰的两位年轻小姐在一起生活的情景。佩斯卡喝了我们的家乡酒，几杯酒刚下肚，酒兴就大大发作，他趁着酒意坚持要我们把他当做道地的英国人，因为他一个接一个发表了一连串演说，提议为我母亲的健康干杯，为我妹妹的